

西方文化教育
谬误之源

〔美〕施文娟／著

吴晖／译



江西教育出版社

西方文化教育谬误之源

—— 从修辞与讽刺的历史演变谈起

RHETORIC AND IRONY

—— WESTERN LITERACY
AND WESTERN LIES



西方文化教育谬误之源

——从修辞与讽刺的历史演变谈起

[美]施文娟/著
吴 晖/译

江西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文化教育谬误之源:从修辞与讽刺的历史演变谈起. / (美)施文娟著;吴晖译.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4.5

ISBN 7-5392-3967-0

I. 西... II. ①施...②吴... III. 修辞学-研究
- 西方国家-古代 IV. H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1332 号

**西方文化教育谬误之源:
从修辞与讽刺的历史演变谈起**

(美)施文娟著 吴 晖译

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昌市红星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9 毫米×1194 毫米 1/32 印张:11.125

字数:260 千 印数:1-1200 册

ISBN 7-5392-3967-0/G·3722 定价:22.50 元

地址:南昌市抚河北路 40 号

邮政编码:330008 电话:6710427

URL: [http:// www.jxeph.com](http://www.jxeph.com)

E-mail: jxeph@public.nc.jx.cn

(赣教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我社产品制作部调换)

西方文化教育谬误之源： 从修辞与讽刺的历史演变谈起

Rhetoric and Irony: Western Literacy & Western Lies

原著

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

(Texas A&M University)

施文娟

(Dr. C. Jan Swearingen)

翻译

美国中阿肯色大学

(University of Central Arkansas)

吴晖

(Dr. Hui Wu)

致中国读者

对许多中国学者和教师来说,西方修辞演讲学(rhetoric)还是个新话题,这可能是因为要在中文里找到相同的概念和实际内涵并不容易。不过一定找不到吗?希望本书的中国读者能够设法为这个问题找到答案,打通中西修辞研究对话的渠道。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现代的角度而言,中西文化都尊重知识,都拥有自己的传统。修辞在西方文化中不单单指“文学”作品的语言或“文体”,还包括古汉语中“文”的意思,即中华传统所尊崇的文辞风采。从广泛的意义上说,“文”也包括西方修辞学上的某些意义。那么,两者究竟有什么相同,又有什么不同呢?在西方,“rhetoric”有时被狭隘地定义为“说服”,即运用一切语言手段,打动听者或读者的心。中国文化人和中国学术界最为陌生的,可能就是西方传统修辞中的“说服”,因为它意味着演说者与听众、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对立。演说者把听众作为对象去争取他们,使之接受其独立的新见解,或更好的主张,因此修辞在西方传统上有敌对和争辩的意思。一个人赢了,另一个人输了。争议是公开的,又是针锋相对的。中华文化中有没有这种传统呢?

长期以来,进行针锋相对的辩论是西方政治、文化和教育活动的主要方式。据说,这在中国不太流行,至少表面上不是这

样。中国的文学传统和政治演说都强调集体观念,尊重传统的智慧和道德观。在汉语里,“文”含有哲学意义上的智慧、古贤传授的知识、传统思维和文辞以及礼仪礼节等意思。可西方却片面地把古汉语里的“文”翻译成“文体学”或“修辞”。同样,将“rhetoric”翻译成汉语的“修辞”也会引起误解,应该修正。古汉语的“文”和西方的“修辞”所强调的是完全不同的方面。西方的演讲修辞往往强调对传统观念的批判,推崇新的见解,为废除陈旧的、不切实际的做法而争论。针锋相对的辩论以及对传统观念提出挑战是西方长期以来一贯的做法。大学教育就是将各种论证和反驳的方法传授给学生。律师和政论家认为意见的交流靠的就是公开辩论,能够运用逻辑推理和劝服手段的能言善辩的人便是赢家。从深层意义上看,汉语讲究文辞风采和西方强调口头辩论也有相同之处。我希望大家能对此进行比较和讨论。作为教师和学者,对不同的文化进行了解可以增进双方的理解和交流。

除了强调针锋相对的辩论,西方的修辞和讽刺手法还讲究“伪装的艺术”,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是建立在这一策略上的。柏拉图给演说者取了一个号,叫“智者”,说他们是“真理的仿效者”。他甚至还暗示,哲学家可能与智者相差不远,理由是,哪个凡人能掌握真理?然而,西方的修辞演讲和文学两门传统艺术就是传授编造真理和现实的手段。历史上有过修辞教育方面的改革家,如西塞罗和奥古斯丁。他们都尽过力,想调整修辞演讲、文学创作与真理以及道德观念之间的关系。但是,西方修辞演讲学有史以来一贯是以“说服”、针锋相对的辩论和伪装为主的。演说者为了达到政治目的,会夸大或歪曲事实,这一点演讲者和听众双方都心中有数。西方修辞演讲学研究的就是如何做到这一点。

西方讽刺手法中蕴含的便是上述文化价值。作家和诗人所接受的价值观念是,文学就是虚构,甚至可以是美丽的谎言。许

多天衣无缝的虚构作品抬高了讽刺的地位,这是因为讽刺手法的模棱两可,拐弯抹角,还能戏弄听众或读者。如果说旁征博引、遣词造句、点到为止、婉转含蓄是中国文学传统的基本价值,那么,比较讽刺手法的运用或许可以促进中国读者了解中西文化间的异同,帮助我们了解对方是如何掌握语言的教学和运用的,因为在中西文化中,课堂教学和文化实践都一直在影响着文学创作和修辞教学。

在西方,修辞至少有两层意思:一是修辞的实践,指公开的演说或演说技能;二是培养演说写作技能的教学规划。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从公元前五世纪起,古希腊的智者们开始传授可能性论理的技艺,围绕“事情可不可能发生”、“事情可能是真的还是假的”而展开讨论。一开始,四处巡游的智者被看成是贤人和知识渊博的教书先生,但后来却不那么受人尊敬了,因为他们在伯利克里执政期间,受雇于想往上爬的政客,为了雇主能在辩论中取胜而鼓唇摇舌。有些人对智者教的辩论技巧和可能性论理方法提出过疑问。很多人认为这种体育竞技般的诡辩,不尊重公共道德信仰,会破坏文化传统。当时旧的希腊贵族统治制度正在退出政治舞台,新的民主选举制度将各地的代表聚集在一起,对政府的政策和社会改革进行辩论。在当时的情况下,修辞辩论的捍卫者认为,只有通过公开的辩论和商议,才能带来对社会有益的变革。于是,公开辩论成了流行的艺术,修辞学也初露端倪。随之,逻辑推理和演讲的技能代替了传统智慧。个人的看法只要得到论证,便可以认定为事实。如果得不到论证,便要废弃。不过,修辞究竟是不是作为统一政治立场的手段而得到发展的,这一点仍然有争议。现实的情况是它还在继续发展。当然,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修辞学从来就不缺少批评家。

从一开始,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修辞演讲学就是西方中小学校和大学教育制度的核心。学生接受修辞演说培训是为了学会演

说的姿态、劝说的手段、逻辑论理的方法,并且要学会出口成章,下笔成文。当然,还要学会如何夹带伪装和哄骗。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聪明人对平起平坐的人要坦诚,对地位卑微的人要虚伪。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没有类似的说法呢?西方历史上有几次文化运动把修辞演讲从伪装和哄骗的功能上引开,强调弘扬传统智慧。在这几个时期中,修辞演讲学强调要引用贤哲和文学家的话,不要唱反调。在西方历史上,修辞就像中国历史上的“文”和八股文那样,源远流长而又波澜起伏。我希望本书能抛砖引玉,促进中西传统文化的比较。

今天,学习西方修辞演讲的大学生来自世界各地。很多留学生自己的国家并没有针锋相对进行辩论的传统,并不鼓励学生对文学经典作品和作者提出批评性的质疑。因此,非西方国家的学生在说英语的西方大学里,常常不熟悉英语写作和说话的方式。可是,学校鼓励他们与教授辩论,要他们进行论说,对业已成名的学者及其观点提出异议,还要他们批评享有历史盛名的文学家和哲学家。可是,从来没有人清楚地告诉他们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论理。说实话,其中可能并没有什么道理!但是话说回来,争议是西方教育和政治论说传统的核心。了解这一历史背景,可以促使我们更顺利地对语言的运用和语言教学中出现的文化差异交换看法。

我教过的留学生中有许多人不熟悉西方传统中说服、论理和伪装的方法,从他们的身上,我学到了许多东西。中文和英文语言习惯的确有所不同,关于汉语的“文”和西方“修辞”之间的差异,我想具体加以说明。二十世纪初废除的八股文是结构非常严谨的正式文体,那时有文化水平的中国人都在模仿,设法掌握。八股文就像当代西方的“五段论论文”一样,段落结构平整,每个段落都是精心安排的,结尾总结段落的要点。但是,与西方论说文不同的是,八股文引用经书中的成语典故,用对偶排比的手法,因为文章不但要对答考题,还要表现文采。这种作文讲究

寓意,但是决不伪装。尽管这类作文讲究的就是引经据典,西方读者却认为是因循守旧,对“引语”的依赖太多。留学生用英语写作时,如果继续采用这种写法,不熟悉东方文化传统的英语教师便会批评他们过分依赖“别人的话”。按照西方的传统标准,只要不是写作人自己独到的想法,那就一定是从别处得来的。精心选用古贤名哲的至理名言也算创新,这一传统手法对西方修辞学来说,还是一个陌生的概念。

以上的话,我有意说得稍微过分些,主要是想说明,西方修辞强调创新、假设和伪装的价值,这对非西方文化的国家来说是很陌生的。通过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来丰富创造力、才智和文采,与西方强调的独奇之论一样,都是有益的训练方法,有利于发挥智力和才能。西方修辞中强调的所谓“独奇之论”,说到底并不是新生事物。它来自二千多年陈旧的篇章结构和选题——对比、对照、原因、结果、记叙等,所以,并不那么新。只要方法新,“旧”的可变新。如果我们能意识到这一点,便能了解和懂得对方。

去年,我第二次来中国旅游,在书店里见到一群学生。他们想找说英语的外国人帮忙完成家庭作业。作业的要求是把莎士比亚剧中的一些格言和句子翻译成相近的汉语成语,再把汉语成语译回成英语。我当时想,这有没有可能是八股文的遗迹,因为八股文的写作讲究引经据典和排比对偶。其中莎士比亚的一句话是“马啊,马,一马换王国”(译注:此句根据本文引语译出,标准译文请参照莎剧汉译版)。等到把与其对应的汉语成语译回成英语时,这句话便成了“机智的国王愿意放弃一匹马来保住王国”。这些学生告诉我,就是在同一语种里,要找到意思相近的成语也不容易。跨语种,难度就更大。西方教师能从这种练习中学到不少东西,因为这些作业告诉我们,每个国家都认为格言典故及其在文学修辞中的作用有着深刻的文化涵义。比如,在现代的中文演说中,我们是否还能感觉到八股文的影响? 废

除八股文以后,汉语修辞中产生了哪些新的写作方法和写作教学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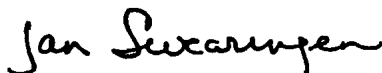
在考虑西方修辞与谎言的关系时,我总是会想,我们西方人竟然会把伪装作为艺术手法来欣赏,竟然认为这种手法比引经据典更好,这真是很奇怪。与我们打交道的人们确实应当了解其中的历史原因。也许经过共同的努力,我们对西方人贬低宝贵的传统智慧的手法和目的,能够有新的认识,能够懂得只要了解其中的方法和目的,作为“文”和作为人之品格的传统智慧是应该被接受的。最后,希望本书能引起广泛的讨论,使我们看到各自文化中的优点与弊端,看到各自语言传统中的失败与成功,这些便是本书中文版的初衷。

美国修辞学会主席(1998 年至 2000 年)

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

英文系教授

C. Jan Swearingen 施文娟



2002 年夏写于英国剑桥

译者的话

《西方文化教育谬误之源：从修辞与讽刺的历史演变谈起》简体中文版的出版是一个多方合作的结果。借此机会，我要感谢江西教育出版社的领导以及责任编辑陈定华先生对本书出版的大力支持，感谢牛津大学出版社版权部王华生(Watson Wang)先生在版权转让过程中的协助。其次，要感谢原作者施文娟教授在翻译过程中为我指点迷津。本人曾有幸成为她门下的学生，学习和研究西方古典修辞学，现在，能将她数年的研究成果介绍给中国读者，感到十分荣幸。最后，还要感谢我的另一半我先生——陈道明的帮助。作为第一读者，他耐心细致地审读了每一个章节。由于翻译时间十分短促，译文难免有不妥之处，还望同行指正。作为译者，本人对翻译的质量负全部责任。

为了方便读者阅读，本书中文版在注解和体例方面作了如下安排：

1. 译文的注释编码与原著保持一致，本书的附录还附上了原注释和参考书目，便于读者对照原文查找参考资料。
2. 译者在正文的必要地方提供了一部分译注，用括号表示，方便阅读。
3. 参考书的作者和书名翻译成汉语后，还在中文书名号之后用括号附上了英语原文。英语论文题目用引号表示，以便读

者对照查阅。

本书牵涉到许多历史人物、地址和书名等专有名词,我在翻译的过程中将其分成两类:第一类是在中文里已经有现成译名的;第二类是本书首次翻译介绍的。对第一类名词的转译,参考的书目有《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叶秀山著的《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97年)和《苏格拉底及其哲学思想》的附录部分(人民出版社,1997年)。所参考的《辞海》,出版年月比较早,我身处异国他乡,无法时常更新中文参考书,所以第二类专有名词的翻译可能会出现与新版《辞海》或其他参考书不一致的地方。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请对照参考括号中的英文名称。

本书中有几个关键术语的翻译需要进行说明。

第一个词是 rhetoric。如施教授在为中国的读者写的前言中指出的,该词在中文中可能找不到对等词。rhetoric 在西方文化中首先指的是演说辩论的方法,而不是仅仅指书面文辞的修饰手法。可是,中文里早已把 rhetoric 与修辞对等起来,因此,我采取了折衷的办法,将该词译为“修辞演讲学”。

第二个词是 literacy。从字面上讲,该词的意义是“读写能力”。但从文化意义上看,特别是在本书中,该词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文化涵义。因而,有时译为“读写能力”或“读写教育”,有时译为“文化教育”。

第三个词是 discourse。虽然很多译者曾经根据国外语言学理论,将该词译成“话语”,可是,在本书中,discourse 远远超过了话语的意义范围,所以,根据上下文的需要,分别将其译成“话语”、“语篇”、“篇章”、“文章”等。

译文对原文中太长的注释有所删减,但仍然保留了关键部分,并不影响对原文的理解。另外,还删减了《开场白》(共二页)和《尾声》(共三页)。原因是这两部分由表面无关联的摘引或诗行构成,不符合中文学术论文的行文习惯,在跨文化的情况下反

而会增加阅读的麻烦。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见附录中的英语原文。最后,本书删减了原文中的索引,因为中文译本的页码与原文的页码不一致,即便将索引翻译过来,也无法查检。

《西方文化教育谬误之源:从修辞与讽刺的历史演变谈起》1991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在美国文化教育界,特别是在修辞演讲学、写作学、文学、哲学以及传播学等领域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该书1991年获得美国大学写作与交流学会的优秀学术专著奖。

施文娟教授英语名为 C. Jan Swearingen。为了尊重作者的选择,本书采用 施教授儿子博智 (Benjamin Jacobs - Swearingen) 为她起的汉语姓名,不再另外音译。博智现在在德克萨斯州立大学奥斯丁分校的中国语言文学系学习,他能流利地听说读写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

施教授在著作中,不但表现了独到的见解,还对其他有关论著进行了借鉴和评议。细心的读者会从注释中发现,她对其他学者的成果进行评议或引用时采取了谨慎、中肯、尊重的态度,即便在批评时也是如此。这表明当代的学术研究成果都是对前人或他人借鉴的结果。个人孤军作战,从空白开始的学术研究时代可能已经结束了。至少在西方,没有一个真正的学者敢说“我的成果不用参考他人的研究结果”。其实,学问懂得越多,研究做得越深,对同行的研究成果便越发尊重。“谦虚谨慎”这句名言在本书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体现。

最近,国内有几所大学遭到抄袭事件的纷扰,大家不免对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表示关注。从这一点上看,本书为国内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如何划分抄袭和参考摘引之间的界线,摘引时如何采用恰当的体例,对被引用者如何给予承认和恰当的评价提供了具体的范例,为进一步发展中国学术论著的标准体例提供了样板。

牛津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本书的原著,是有其历史意义

的。如书中所述,西方修辞演讲学始于古希腊罗马时期,主要用来培养能言善辩的文化和政治精英,参与城邦政治和法庭辩论。当代西方政治演说、政治辩论(如总统竞选辩论的模式和演说方式)还有法庭辩论仍然继承了古代的传统。古典时期的修辞教学理论和形式仍然还是当代西方文化教育传统的源泉。

20世纪初,美国学术界将古典修辞演讲学用于传播学。50年代以后成为最有影响的学科之一,促进了新闻传播、跨文化交流、交际学、公共关系学等学科的创立和发展。八十年代初,古典修辞演讲学开始对美国写作学产生影响,为篇章的逻辑分析、创作思维以及篇章中蕴含的文化因素提供了理论依据。九十年代初,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显示美国的大学教育仍然建立在古希腊罗马的模式上,崇拜以欧美男性为主的文化标准,培养精神贵族,排挤黑人、妇女以及其他种族的人民。所谓独立思想或辩证能力只是对有幸受到高等教育的人士而言的。如果不进行反思便无法解决美国多元化文化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西方文化教育谬误之源:从修辞与讽刺的历史演变谈起》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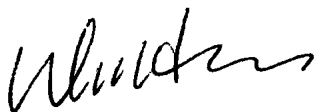
作为译者,我希望本书的简体中文版能为中外学术交流弥补某些空缺。中国翻译出版过西方教育哲学、语言哲学、文艺评论等方面的理论原著,前几年开始对西方修辞演讲学进行初步的翻译介绍。1998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当代西方修辞学——演讲与话语批评》(常昌富主编)即为一例。这些译著在不同的程度上促进了中外学术交流,有助于国内学术界了解西方理论的发展。但应当注意的是迄今为止,大多数翻译作品只着重介绍国外的理论以及学科的基本知识,很少介绍西方学者对自己学术传统的批评。因此,从历史角度严谨系统地批评西方传统的论著还不多见。施文娟教授著作的出版正填补了这一空缺。

近年来,大家都在强调发展中高等教育,提高学生素质,培

养学生的创造能力。要达到这一目的,我们不但要坚持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汲取他国之所长,还要认识到西方在文化教育上的局限和弊端,这样,才能避免盲目仿效。

本书对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文化教育进行了恰如其分的批评,为中国读者提供了可靠的参考资料,有助于国内文化教育界全面了解西方文化教育传统的形成和本质。

美国德克萨斯基督教大学英语语言文学博士
中阿肯色大学修辞与写作终身制助理教授
吴晖



2003 年春写于阿肯色州康维市

导论

对苏格拉底来说,自我认识(self-knowledge)只意味着分割与区别,不包含什么具体内容。虽然“分割”和“区别”后来发展成为认知的本体,“认识自我”只不过是把自己与他人分离开来。

克尔恺郭尔(Kierkegaard)《讽刺的概念》

自古以来,教育一贯重视培养道德行为和口才两个方面。这两门课属于同一学科,教授既教道德规范课又教修辞课……

虽然这两门学科密切相关,但这种全面教育被苏格拉底所分裂。他的论说把灵活的思维与口若悬河的演说才能分开……造成目前毫无顾忌地将唇舌与头脑分开的现象,导致一部分先生教思维,另一部分先生教演讲。这种学科分类荒谬之极,事倍功半,遭人指责。

西塞罗(Cicero)《论雄辩者》第三卷,第16章,第57~61页

讽刺已渗透到现代语言中……深入到所有的词汇和语言形式中……

……修辞中既有清白，也有愧疚；可以击垮对方，大获全胜。对话时，击垮对方恰恰破坏了话语的生存之本——对话的氛围，在古典修辞时期，这种氛围尚未形成。

巴赫金 (Bakhtin) 《演讲流派及晚期文论》

“教育与谎言”、“修辞与讽刺”两对词汇放在一起就像两双不成对的袜子，但这种组合绝不是生拼硬凑，早期西方文化教育不但早已注意到这四种概念之间的关系，还持续关注其涵义的扩大。它们祖先的魂灵不但反复出现在前柏拉图时期的哲学手稿中，还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柏拉图的论述中。亚里士多德的系统论著把它们规范化了；西塞罗和奥古斯丁的著作在评论希腊修辞学的同时，还将它们提高与发展了。这些著名历史人物就像现代考古学家说的——既是观察者又是参与者。虽然这些学者常被誉为影响西方早期文化教育的思想家和开明的人道主义者，他们同时又是具有批评眼光的观察家。他们观察新兴的哲学思想，掂量其轻重；他们还是批评家，评估文化教育的得失，尤其是新生的教育学科——修辞学、文学、哲学的发展与局限性。他们注意到了现代人熟视无睹的现象——日常用语、政治用语和文学用语就叫做“修辞”，这些语言规范的教学和实践一旦与文化教育水平相结合，便能形成权威。写作得到广泛运用以后，文字、语法、文学流派、审美标准等方面不但出现了规定和模式，还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现象。

哲学流派与修辞学、文学以难以预料的形式同时发展，有时完全摒弃写作，比如，苏格拉底派和斯多葛派。许多哲学家贬低修辞学和文学，认为这两种学科缺乏深度，只能用来蛊惑人心，给思想浅薄的普通大众消受。哲学家孤傲的态度使大众百姓远离哲学，认为哲学在“技巧上吹毛求疵”，在“语义上钻牛角尖”，与日常生活毫不相干。与此同时，大家熟悉的传统思想以不变